

抗战胜利后,中国为何放弃 1200 亿战争赔款

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,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.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,日本借此大力发展了重工业、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。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,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。然而,二战结束后,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。此后,由于时事变换,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,这段历史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。

美国违背诺言,从中作梗

在处理日本问题上,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,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,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,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。

1945年由中、美、英三国发布的《波茨坦公告》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,即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,其余的用来赔偿。

战后初期,美国曾推行“先期拆迁”计划,即将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%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,其中中国可得15%。但随着美苏对立加剧和中国解放战争的推进,美国为扶持日本作为反苏反共基地,不断缩减赔偿范围。

中国战时损失,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,按当时价格计算,不下620亿美元,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,只占万分之三。中国分

得的赔偿物资中,最大、最新、最完整、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淞“11—5—5”海军兵工厂的1.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;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。中方得到通知后,立即派专家前往拆迁。

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,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,取消了“先期拆迁”计划的执行,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。至此,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。

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

1949年下半年,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: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,国民党当局撤到了台湾。台湾当局为获取美国支持及维持所谓“中国合法政府”代表的形象,在对日赔偿问题上态度大变,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赔偿。

1952年2月17日,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。谈判几经周折,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,最终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。

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赔偿

1971年10月25日,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,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。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

70年代初,由于国际战略格

局发生变化,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: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;二是征收10%的进口税,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,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。不久,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,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。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。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机渐趋成熟,战争赔偿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。

1972年7月以后,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,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:第一,中日邦交恢复以前,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,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。第二,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,必须与台湾断交。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,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。第三,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,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,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。

1978年8月12日,在北京发表了《中日共同声明》,中日两国签订了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。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,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。但是,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——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,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。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,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。 于翔

罗荣桓教子:搭公共汽车是锻炼

生活中的罗荣桓(1902—1963,今湖南衡东县人)性格内向,爱读书、喜书法,不抽烟,也不喝酒,不题词,不爱照相,生活严谨,宽厚待人,他教育孩子讲得最多的话是“不能忘本”。其长子罗东进回忆说,有一次父亲的部队打了胜仗,他捡了个日军的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,跑到街上又蹦又喊,把老乡的孩子都吓哭了。这件事情被罗荣桓知道后,他严厉地批评罗东进道:“你寄养到老

乡家的时候,路都不会走,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,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。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,就忘了本!”说完后,又叫罗东进在屋内反省,以让他牢牢记住这件事。

罗东进上小学时,子弟学校离家很远,每周回家一次,都是轿车集体接送。一个周六,学校放学晚了,家人便派罗荣桓的车去接。罗荣桓发现后,把全家人叫到一起,严肃地说:“车是组

织上给我工作用的,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。如果不自觉,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。”他又吩咐工作人员:“以后绝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,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!”

此事影响极深,后来有一次罗东进和妹妹放学回家,没有搭上公共汽车,便走了回来。当时天已经很晚,甚为担心的罗荣桓在问清原因后,高兴地表扬了他们。 杨飞

“社牛”陈世骧 与“社恐”张爱玲

陈世骧是第二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,九三学社社员,著名生物学家,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与张爱玲共事两年。

1955年张爱玲到美国后,作品打不开局面,又负担第二任丈夫赖雅的生活及医疗费,生活不宽裕。1967年赖雅去世,张爱玲想找份工作赚钱。文学家夏志清得知后,向主持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推荐张爱玲,陈世骧欣然同意,张爱玲成为研究员。这份工作给张爱玲漂泊的生活带来安稳,她十分感激陈世骧。

张爱玲性格孤僻、有社交恐惧症,刻意回避与人交流,行为怪异。伯克利大学安排陈少聪给她当助手,两人同办公室,中间隔着薄板。陈少聪发现张爱玲有严重自闭倾向,便把资料卡片整理好趁她不在时放桌上,把说明事宜写在纸条上,减少接触。后来,张爱玲白天不来上班,快下班时才到,一直工作到深夜,成了众人眼中的异类,惹来是非闲话。

陈世骧好客,常在家举行聚会,张爱玲虽不喜欢交往,但有时也不得不去,却总显得不合群。有一回聚会,陈世骧说大家像大家庭,张爱玲却表示最怕大家庭,扫了众人兴。还有一次,陈世骧宴请张爱玲,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,张爱玲只和陈世骧说话,对其他人一概不理,去过两次后便拒绝再应酬。

陈世骧对张爱玲递交的研究报告不满意,认为所集词语太少,给另外三位学者看也都说看不懂,张爱玲重写后陈世骧仍说看不懂,两人起争执,又有语言误会,不欢而散。

1971年5月,陈世骧突发心脏病离世,张爱玲感冒仍去参加追悼会,只待几分钟就匆匆离去。她一直感激陈世骧,陈的突然去世让争执无法解释,她十分纠结。《蚤满华袍——张爱玲后半生》作者伊北评价:“他们都没错,只是脾性不合,注定无法走远,一个不说、一个不懂,这就是距离。” 唐宝民